

盛世危言

通論

道器

夏元著

香山鄭觀應陶齋著

鄭觀應傳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於廣成

夏東元著

鄭觀應傳

(修訂本)

顧廷龍署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



21043799

1043799

责任编辑：王少如

郑 观 应 传

修 订 本

夏 东 元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昆山亭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40 千字

1985 年 11 月第二版 198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本

统一书号：11135·003 定价：1.85 元

再版自序

《郑观应传》自1931年问世以来，引起国内外学者和读者的很大兴趣，国内报刊发表书评、报导给予鼓励，美、日等国一些学者也有较好反映。这当然是与郑观应一生活动及其代表作《盛世危言》长期在人们心目中影响很大有关。

《盛世危言》刊行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它的问世，在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政治、经济各界，都引起强烈的反响。不仅戊戌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等人受到其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非常喜欢郑观应的《盛世危言》。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回忆说，由于父亲只准读孔孟经书之类的书籍，所以“在深夜里把我的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才读完了《盛世危言》；又说：“《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①郑观应及其代表作《盛世危言》有如此大的魅力和引导力，绝非偶然。这主要是因为郑氏的思想核心是“富强救国”，是通过社会改革把中国从落后变为先进，从封建主义推进到资本主义，也就是要变贫弱的中国为富强的中国。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其他作品，大多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关于改革社会的阐述。他所谈的改革，在当时同类著作中是涉及社会问题最为广泛，看问题也最为深刻的。除在政治方面强烈要求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制，及相应地进行政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09、110页。

DS 5-3/3

府吏治、财政收支等一系列民主改革之外，突出地要实行经济方面的改造。郑观应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力招集商股为主，必要时也引进外资进行“华洋合办”，以加快实业建设的步伐；对于外国的技术设备，从仿造逐步做到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流通费用，加强竞争能力，以利于与洋人进行商战，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在对外交涉方面，他主张以不断加强的实力作后盾，运用公法，进行平等外交。在军事方面，他对建立强大的新式海军和陆军及如何建设好这样的军队，提出了设想和方案；为了更有效地防海戍边，主张建立正规军与民兵相结合的军事体制。郑观应认为，要完成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决定性的一环是必须培养出一大批与改革事业相适应的各种专业的新型人才，所以郑氏始终把培养人才放在首要的地位。他明确认识到，实行除旧布新的改革，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改革人才，一切美好设想都必将落空。“国之盛衰系乎人”，“有治法必须有治人”，这是郑观应始终不渝的人才观。此外，在郑氏的著作中，对女教、女权、社会慈善福利、社会风气的改造，乃至流民和犯人通过劳动教养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都有论述。如能按郑观应的方案实行，是可以使衰弱的中国臻于富强之境的。以《盛世危言》为主的著作，可以说是救世箴言，确是有生命力的，至今读之犹有新鲜的现实感。

郑观应是这样一位立志改革的、有影响的进步思想家，但知其全貌者极少。《郑观应传》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这就难怪读者和学者对它发生浓厚的兴趣了。不少学者所写书评和个人来信，提出了中肯的宝贵意见。这次作修订，为了保持原书的风格和面貌，原则上是“增而不删，订而不改”，所以确切地说是“增订”。

所谓“订而不改”，就是只订正一些讹误和某些不准确的讲

法以及错漏字等；对于全书组织结构、观点内容、行文方法等，一概不予改动。所谓“增而不删”，就是只增加新内容，原有内容一概不删减。至于“增”的内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所用材料单薄、论述不够充分的部分予以增写。例如第一章《买办出身的民族资本家》，有的同志认为具体资料尚嫌不足，这次补充了一些。又如，全书对于郑观应同盛宣怀的关系虽在各章有所论述，但他们的相同观点和不同观点缺乏比较系统的阐述，所以除在不少地方有补充外，又集中在第五章增加了《郑观应与盛宣怀亲密关系的开端》一节。

第二，增补了不少未刊资料。有的学者提议，由于《郑观应传》中所用的大量未刊资料不易见到，希望能在再版时多引用一些。所以在这次增订中，凡遇有重要的珍贵的未刊材料，尽可能在正文中多引用几句，或在脚注中多节录一些。

此外，附录《郑观应一生经历记略》也作了较多的补充和调整。

这次修订，全部资料与原文核对工作是由薄芳同志完成的，我在这里表示感谢。

夏东元

1984年国庆节序于华东师大

序

夏东元同志的《郑观应传》已完稿，我先读为快之心切，索取手稿读之，觉得无论是对郑观应的评价和洋务运动史的识见视野，或者是书中体现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和严谨的学风，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欣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此稿排印问世，写几点读后感，算是我乐而为之的序言。

《郑观应传》是夏东元同志多年研究的成果，全书内容是他研究洋务运动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远远超越了洋务运动史的范围。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是我们繁荣学术的关键。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认识和反映这个客观规律，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作为今天乃至明天的借鉴。这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掌握丰富的史料，从史料的实际出发进行研究。夏东元同志写作《郑观应传》时，确是力图这样做的，为了尽可能反映郑观应的全貌，作者除阅读已刊行的资料外，还翻阅了大量未刊的档案材料，其中单是郑观应自己写的和其他人写的有关的信函就达千余件之多。郑观应虽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但对他有比较全面了解的人并不多。就其生卒年代来说，在过去，生年就有从1840至1844年五种说法，卒年也有1920至1923年四种说法。究竟生于何时，作者用了不少工夫，找到了郑的三份生辰八字，作了定论。关于卒年，作者1979年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的《郑观应思想发展论》中，定为1923年死于澳门，为慎重起见注明“暂定”。

待考”。兹后经过调查，定为1922年5月死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内，1923年迁葬于澳门前山。所谓“1923年死于澳门”，是把“迁葬”的时间地点误认为是去世的时间和地点。这样，郑的卒年也就清楚了。

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经济。要阐明历史规律，如果不认真研究经济、经济史，就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是难以认识和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郑观应一生的社会实践是多方面的，其中更多的是企业经营活动，在经济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合乎科学的经济理论和经营方法。本书对郑观应的经济活动、经济思想的叙述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这是应该的。其中有三点我想提一下。

首先是郑观应与洋商进行“商战”和“有工以翼商”的思想。郑观应自己说：“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确实，“与洋商争利”的“商战”是他平生一大志愿。这里所谓“商战”，并不是专指商业，而更重要的是指发展工业。郑观应认识到，要进行商战和操商战的胜券，没有强大的工业作后盾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郑观应所说的“有工以翼商”。郑观应绝不是只注重流通领域的重商主义者，而是非常强调生产过程的重要性的。此其一。

其二是“全以商贾之道行之，决不拘以官场体统”。要与洋商在市场上角胜，必须拥有价廉物美的商品。郑观应懂得，要做到这一点，非在生产中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可，这就必须“以商贾之道”办企业。所谓“商贾之道”，对资本主义来说表现虽然很多，但归根到底就是剥削剩余价值之道，就是加速资本周转率使之尽可能多地发挥赚取利润的作用。这对资本持有者本来不成问题，但当时清政府搞的“官督商办”往往违反“商贾之道”，以做官之道管理企业，即所谓“拘以官场体统”，这就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削弱了竞争能力。要求以“商贾之道”办企业，实际上是要求在发展新的生产力的同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排除夹杂着的封建关系。

第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很多，起决定作用的要靠先进的技术。所以郑观应很强调学习西学和引进机器设备，并主张设专厂制造机器。他的“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的论述，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商战”的合乎规律性的见解。

本书对上述问题都有比较系统的阐述。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有规律可寻的，一个历史人物也不例外。在我看来，郑观应一生的主导思想是爱国主义。从这点出发，他要求抵御外侮，反对侵略；要达到反对侵略的目的，必须富强，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他根据自己的实践体会，发觉阻挠资本主义发展的是清朝封建专制制度，于是始而托古改制，提出实行与“三代法度相符”的议政制，继而激烈地要求实行英、日等国的君主立宪的议院制。这样，郑观应就形成用君主立宪式的民主制保证工商业发展以致富强，从而达到抵制侵略和维护国家民族独立目的的一套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郑观应是怎样从爱国观点出发形成这一思想体系的？这个思想体系的发展过程如何？必须弄清郑观应代表作品的写作和发表过程，才能更好地说明这些问题。《盛世危言》是郑观应的代表作，但据目前所知，此书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是版本较多的一种。从它的前身《救时揭要》、《易言》到1900年《盛世危言》八卷本，究竟有多少版本？哪些是郑观应手定的能代表他的思想发展的？作者为此做了不少工作，到现在为止，已收集和看过二十余种（见书末《〈盛世危言〉版本简表》）。虽不能说已经收全，但通过这些版本的比较鉴别，一些手定的能代表郑观应思想发展的版本基本上可以确定，因而也就可能比较正确地阐述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从而可以抓住他的思想脉络和线索了。

这条脉络和线索在本书中是这样反映的：郑观应从爱国救

国出发，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前期，基本上是感性认识阶段，即主要是对外国侵略者和社会腐朽现象的愤怒揭露与正义感式的批判；七十年代下半期到八十年代初，则提高到理性的认识，透过现象对社会本质的问题有所认识，并初步提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以致富强，多少改变一些专制制度，实行议政制以通上下之情等。八十年代后半期到九十年代，随着他的社会实践不断丰富，维新思想成熟了。他不但在抵御外侮方面，在军事、外交、经济、思想文化方面设计出一整套办法，而且在内政改革方面除强烈要求实行君主立宪议会制度外，也设想出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改革方案。这些，郑观应大多写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此书从1894年初刊的五卷本到1900年刊行的八卷本，经过不断修改补充，在当时可算是讲维新变法最完整的一部书。中国近代教育家、当时任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就说过：《盛世危言》“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蔡元培是1896年讲这话的，无法确定他看到的是初刊五卷本还是增订本，但至少可以肯定他未看到八卷本。增订的八卷本就不是“条目略具”，而是很完整了。在1895年以后那几年，社会上曾一度出现过《盛世危言》热，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郑观应不愧为进步的思想家。

然而，二十世纪初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并逐渐蓬勃发展，郑观应在经济主张上虽仍有积极意义，可是，由于他坚持君主立宪，政治上落后了。但郑观应的主导思想是爱国主义，是一心要把中国“登于富强之域”，并且在救国御侮、发展科学技术以尽快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厌恶专制、实行民主这些本质问题上，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着不同程度的一致性，所以在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崩溃的条件下，他没有明显的反对共和的言论和行动。在此后袁世凯倒行逆施搞专制独裁和北洋军阀黑暗统

治下，郑观应且有某些赞同共和的表示，这是合乎郑观应的思想发展逻辑的。

夏东元同志的这本《郑观应传》，不仅资料丰富，且多新意，确是当前洋务运动史和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值得珍视的一本新书。

夏东元同志研究洋务运动史多年，他在写这部传记前，已编定了一部《郑观应集》，近年又在着手撰写《洋务运动史》专著。我为《郑观应传》的完稿问世而道贺，并祝愿他编著的《郑观应集》和《洋务运动史》都能早日出版，完成他多年的宏愿。

吴 泽

1981年五一节序于华东师大

前 言

郑观应(1842—1922年)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

郑观应的思想核心可以概括为“富强救国”四个字。他一生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以拯救民族于危亡。为了达到“富强救国”的目的，他在丰富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经营近代工商业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郑观应对自己的思想曾作过如下表述：

“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这几句话虽是郑观应于1909年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说的，却是他五十年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他大半生大量著述的思想结晶。在这里，郑观应把“攘外”作为救国的头等任务，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这一思想体系，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因为它反映了客观形势的需要。

郑观应出生于1842年《江宁条约》签订之前一个月，十七岁那年(1858年)走上社会就业时，正是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兹后几十年，他经历了庚申之变、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

争、八国联军入侵等重大的屈辱事件，目睹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和中华民族濒临被瓜分的惨祸。处于这种形势面前，郑观应把“攘外”作为救国的头等任务，这是他爱国御侮热情的表现。

“攘外”靠商战，还是靠兵战？郑观应认为，兵战固然不可忽视，但它是“末”，商战才是“本”，即他所说的“商战重于兵战”，绝不能“舍本而求末”。他从商战这个基点出发，提出了建立工业体系以保证商战胜利的见解。

要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进行商战，必须要有强大的工业作为后盾，即所谓“有工以翼商”。因为商战必须要有丰富而又价廉物美的商品，而这只有发展近代工业才能做到，否则商战就是一句空话。要使商品能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取决于先进的机器技术的使用。郑观应是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他很注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引进先进的机械装备。为了不受外国人的挟制，单靠购买和引进机器技术是不行的，必须自己能够制造这些机器。江南制造局等军用工厂主要造军需品，而且效率很差，因此，郑观应早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即提出设专厂制造民用机器。

单靠在工厂里使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还不一定能使商品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和到达消费者手中。郑观应明确认识到，必须要有新式的交通运输和电讯设备，才能降低运费和了解商情。所以，他十分重视发展近代航运业、铁路、电报等事业，并对发展这些行业的意义和办法有比较合乎科学的说明。为了同一目的，郑观应又建议废厘金，减税收，享受与洋货同等的轻税免税的权利。这还不够，要发展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必须具备动力、原材料等条件。于是郑观应又提出大力发展煤炭、金属的采掘和冶炼等工业。为了使工商业顺利发展，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他主张自己创办银行，以解决生产和流通中的矛盾，促使

商品和资本加快周转，他的“银行为百业总枢”的认识是深刻的。

可见，郑观应为了操商战的胜券，对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都有周密的考虑和措施。但要把工厂、矿务、交通运输、银行办好，关键是要有足够的新式管理和技术人才，否则“借才异域”，不仅要受人挟制，且工薪很高，增加了产品的成本。所以郑观应不断地大声疾呼，把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放到很重要的位置。

由此可见，郑观应关于商战的思想体系是完整的。他认为，只有发展近代工商业并在同外国资本主义商战中获胜，才能达到富的目的；只有富，才能真正的强。不但在经济力量上说是如此，而且从军事技术上说也是如此；整个工业水平提高了，军事技术才能更高。他写道：

“我国亟宜筹款，广开艺院，教育人才，以格致为基，以制造为用，庶制造日精，器物日备。以之通商，则四海之利权运之掌上也；以之用兵，则三军之器械取诸官中也。此国富民强之左券也。”

这些话说明，军事技术的提高取决于整个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的提高。郑观应认为，不注重商战而单搞兵战是绝对不能强的，即使强也是表面的。他说：“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若舍本而求末，入不敷出，徒知聚敛，不复开源，转令民不聊生，盛亦难恃。如花树无根，虽暂华而旋槁也必矣。”

郑观应是不是实业救国论者呢？不是。他是很注意政治制度改革的。他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实践尤其是经营工商业的实践，深切地体会到，工商业的发展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作保证。在这个制度下的政权，必须是对新式工商业支持、能代表商民利益的。因此，它必须是有商民代表参加的有一定民主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郑观应认为，如果政治不改革，仍然保持封建专制政权，就一定会扼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使工商业

受到摧残。因而他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提出实行君民共主的议政制，即稍后明确提出的君主立宪制度。这个制度是承认君权前提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当时如能实行，不失为一种比较适应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制度。这里表明，郑观应已知道政治对于经济的阻碍和促进的作用。他说：“宪法乃国家之基础，……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必须象西方国家一样，“商人得参与政权，于是人民利益扩张，实业发达”。郑观应非常强调要有“治人”，以制订适合工商业发展的“治法”。有了“治法”，还必须有执行“治法”的人。这就是说，这个“治人”，既是“治法”的制定者，又是“治法”的执行者。他说：“有治人而后有治法，有治法必须有治人。二者不可须臾离也。”这里所讲的“治人”，当然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制“法”和执“法”，都必须具有新的资产阶级知识的人才可能办好。如果一脑袋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怎么可能制订出资产阶级的“治法”？又怎么可能贯彻执行资产阶级的“治法”？欲新“治法”，先新“治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据上所述，郑观应是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作为达到“富强救国”的两根杠杆的。这两根杠杆实际上就是民主与科学。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两面旗帜。它是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人们在摸索富强道路上的正面和反面经验的总结。郑观应则是在这正、反经验中亲历其境者。在他的脑子里已孕育了民主与科学思想的胚胎。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魏源已开始有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萌芽了。他提倡“师夷长技”，创立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他说，中国应该象西方国家一样，用科学技术“夺造化，通神明”，“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①。应该认

^① 魏源：《筹海篇三》。

为，这是企图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改造中国的开端。魏源在要求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对于西方民主制度也是憧憬的。他很称赞美国的大总统“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的公举制度；对于美国“议事诉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①的制度，也表示羡慕。这实际上是对民主制度的肯定。魏源虽然没有、也不敢说出中国的君主专制不若美国的共和制，但他对美国“以部落代君长”的联邦民主制却给予“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的称许，尽管他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约与魏源同一时间，其他立志改革者也对技艺与民主的问题有所阐发。例如，1844年梁廷枏的《海国四说》、1848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都有表述。梁廷枏说，英国用蒸汽机于火轮船和火车，“驶行特速，可省运费”；而“纺车织具，并以水火力代之，机动而布自成，故制成多而用力省。”^②徐继畲在谈到法国工艺精巧时，特别强调科学技术不断前进的优点，他说：“其法时时变易，奇幻出人意料。”^③这实际上是反映资本主义竞争特征的论述。梁、徐在技艺之外，对美国的民主制都是赞许的，并比魏源有所发展。梁廷枏说：“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故“终未尝以人变法”。他称赞总统制的优越性，说总统“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这就是说，美国的总统届期必退，既不能恋栈不走，又不能自定接班人，这就防止了终身制，也防止家长式的偏见。所以梁廷枏赞道，中国古代所谓“视听自民之茫无可据者，至是乃彰明较著而行之，实事求是而证之”了。梁廷枏又进一步论证这种制度的好处还在于促使总统努力工作，力求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59。

② 梁廷枏：《兰伦偶说》，卷4第16页。

③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7。

在短短的任期内加快步伐有所作为，他说：“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思，而无使复当前之悚，斯已耳。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治其民以口实者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美国总统不可能是尸位素餐者流。梁廷枏的结论是：由于美国法治而非人治，政事“一公之民”，故此制度比较健康，“是以创一开辟未有之局，而俨然无恙以迄于今也”^①。

冯桂芬对西学的论述要比魏源、梁廷枏等人具体得多，他说，西学中的宗教经典，“皆猥鄙不足道”，而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以及舆地、农业器械、制造技艺等学，“皆得格致之理，……多中人所不及”，应该向他们学习，并有信心地说：“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至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他虽没有正面发表议论，但他所说“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实际上就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优点同中国专制制度的缺陷联系起来作比较。这是冯桂芬超过魏源、梁廷枏的地方。

洪仁玕比魏源、冯桂芬要高一筹，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技艺”、“邦法”都很重视，并且试图在中国实行。他于1859年所作《资政新篇》在这两个问题上议论较多。由于洪仁玕对中国社会情况了解得不那么清楚，对这两个问题的思想也不那么明确，论述是含糊的，对思想界的影响不大。

可见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民主与科学问题上还只有朦胧的启蒙的认识素材，谈不到在实践上的经验教训。六、七十年代之后却不同了，它提上了实践的日程，因而思想家可以从实践中来总结了。1860年前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新的变革思潮，总的倾向是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即使清统治集团内部原来很顽固的人，也知道不变不足以拯救清

^① 梁廷枏：《合省国说·序》，道光二十四年。